

# 蒋介石与抗战时期“联美制日”目标的实现

张祖奕

---

**内容提要**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于美国及国联,公开声言要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然而事与愿违,国联敷衍,美国保持“中立”,置蒋之寄望于不顾。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奋起抗日,以此正告美国不可忽视中国抗战,要求改变其袒日立场转而制日援华。蒋最终抓住历史时机促成中美两国结盟,实现“联美制日”目标,也因此开辟了中国战时外交中难得一见的“平等共存”局面。其意义重大,但亦不乏过程中的种种艰辛。

**关键词** 抗战时期 蒋介石 联美制日

---

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系南京国民政府战时外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日本侵华以来,处于内忧外患的国民政府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从未停止过寻找“可靠”的盟友。在经历过与苏艰难复交、对德展开短暂军事贸易等一系列波折之后,蒋介石将盟友的核心目标锁定为美国。从初期求助国联的失败,到“联美”方针的提出;再从争取美国改变中立以求制日援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直至促成两国“联美制日”与“以华制日”政策的合流,中美结盟一路走来,其中充满了酸楚与艰辛。蒋一面想努力摆脱外交困境,一面又诉求能够被美国平等对待,最终在美国国家利益的驱使下得以部分实现。本文拟以蒋介石“联美制日”目标实现为中心,探研蒋及南京国民政府在对美外交中所走过的一段艰难而无奈的求援之路。

## 求助国联的真实目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当即电令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就“日军侵略中国东北”一事向国联提起控诉,要求其出面制止,恢复事变前状态,并责成日本赔偿损

失。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又下令成立以戴季陶、宋子文任正副会长的“特种外交委员会”(简称“外委会”)研讨对日决策,但实际上则是根据蒋的意图加强对国联和美国的外交活动,以谋求依靠美国及国联的力量来解决中日冲突。至于国联与美国的分量孰轻孰重,“外委会”成员主张“如国联无办法,再请美国提出九国公约以制日”<sup>①</sup>。为此,蒋介石于9月22日公开向全国宣称:“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sup>②</sup>国联是否真能抑制住日本暴行,蒋并非不知道答案。然而,蒋所“静待”的并非只有“国际公理”,他更期待此次求助国联成为一次“转机”,在23日的蒋日记中将其清楚地阐述为“此为外交之一转机,亦为我国内统一之转机,如天下不亡吾中国,或引此次外交或不至失败乎”<sup>③</sup>。是日,南京政府便照会美国外交部,希望对方能对日本蓄意违背《非战公约》做“深切关怀”。

但事情并没有按照蒋的预定方向发展。国联只是敷衍地通过了一个既不谴责日军侵略、又不主张采取任何实际措施的所谓“不扩大事态”的

决议,对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中日紧张关系根本没有任何帮助,美国更没有做出任何积极表态。直至1932年1月7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史汀生才发表“不承认主义”声明,希望日本政府能在没有外国介入的情况下控制局面,防止事态扩大。美国的此次声明似乎已然忽略了日本对美国在华利益的覬覦和攫取,甚至从实质上间接承认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合理性。正是因为美国和国联如出一辙的对日绥靖妥协,使得日本更加有恃无恐,继续增兵向中国境内扩张,进攻袭击中国军队。次年1月2日,即日本轰炸占领锦州后,史汀生才明确表示反对日本以武力手段侵占中国领土。美国此举虽亦可算是对日本侵略的谴责和抵制,却依旧显得空洞无力,作用有限。

1935年7月12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在照会中国驻美大使时,不仅对日本侵华的真相佯装不知,更变本加厉地要中国和日本同样承担对“和平与世界进步之重大打击”的责任,刻意扭曲日本侵华的事实。是年8月25日,日本在华北和上海扩大战事后悍然宣布封锁中国海岸,英美竟然也予以接受和承认。9月14日,美国随即实施“中立法”,宣告对中日双方均禁止输出包括军舰、飞机、战车在内的武器、弹药及战事材料等。而事实是,美国只对中国禁止输出相关战略资源,对日本却照常以各种手段输供。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势力以各自国内利益为出发点,名为中立,实则几乎放弃维护国际条约道义的责任,公然站在日本一线,对尚未体现出战略意义的中国需求视而不见。蒋介石打出的第一张倚赖国联壮大声势的外交牌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他坦言:“列强所谓助我者,仅予日本以一骂,而日本必即还我以一刀。”<sup>④</sup>

1937年11月3日,九国公约签字国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将中日问题纳入议题。由于国力衰弱,仅凭一己之力实难抗衡日本,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此次会议不得不再寄予极大希望,甚至愿意做出重大让步。蒋为此不惜改变军令,要淞沪前线的将士在极端不利的形势下再撑持半月,期待各国予以同情。果然,该会议提出“愿竭力促成中日问题之永久解决”,“顾及各国

及日本在华利益”、“以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为中心内容”等14条建议<sup>⑤</sup>,以美国为首的各国均采取观望和消极调停态度,并拒绝苏联代表提出的集体安全原则和讨论对日本的制裁。这次会议最后只在11月1日通过了一个宣言,轻描淡写地总结中日冲突影响各国利益,日本施用武力绝不能达成公正而永久的解决<sup>⑥</sup>,待24日会议结束当天又重申了一番九国公约维持世界和平的原则。中国代表顾维钧就此提出严重抗议,指出“这次会议,一开始就表现出它主要不是一个向中国提供有效援助或解决中日冲突的工具,而是一个为英法提供摆脱困境的方法”<sup>⑦</sup>。诚如其所言,美国不但没有对日本施加压力,反而多方讨好、笼络日本,源源不断地供给日本石油、橡胶、锡等相关作战物资。处此情势之下,蒋介石只能接受“中国不能从各主要国家获得有形的援助,……至少在暂时中国只能独自抵抗其敌人”的现实<sup>⑧</sup>,以国联为载体展开的外交造势几乎成为纸上谈兵。

除此之外,蒋曾期待借由国联隔空向美国喊话寻求实质援助,无奈美国并未就范。刚上任不久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坦承:“对中日战争运用中立法,吃亏的是中国,占便宜的是日本。”<sup>⑨</sup>就连被冠上“亲美”头衔的宋美龄也对美国的做法大表不满,她毫不客气地指出:“民主国家的逃避责任,毫不愿意开罪这个劫掠屠杀无所不为的日本军阀,并且对于保卫自己的国民及其财产利益等不敢有所作为,这自然是增加了日本不顾一切从事征服的野心。”<sup>⑩</sup>

在美国看来,中日战争好比“一场英国式的足球赛”,美国当局把中国当做“先上场的第一队”,任其“和日本拼命厮杀”,到“快要疲惫的时候”,“先坐在一旁瞧人家的”美国再“参加进去作最后的一着”,以决定全局的胜利<sup>⑪</sup>,其意可鄙。英、美不愿为中国得罪日本,亦不肯为中国而卷入战争,只要能保住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利益,他们会满足日本的侵略要求,对日妥协。当初求助国联,本身旨在营造国际同情的大气候,而论及真枪实弹的物质支持,必须得到美国的首肯。一旦蒋在前者失利,那么放手一搏的就必须、也只

能是力求“联美”。

### “联美”方针应运而生

1937年的“七七”事变爆发,蒋介石改变策略,决心以抗战应对国联的敷衍和美国的中立。他先是在同年7月21日在国内公开讲话,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在军事上亦调动军队向河北晋绥边境增援,并已下令全国准备应战”<sup>⑫</sup>,声言“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日之责”<sup>⑬</sup>。是年9月27日,蒋又以“行政院长”身份代表国民政府向美国当局提出强烈抗议,指出:“中国此次抗战,不仅攸关中国本身之存亡,且亦为九国公约之联盟伸张正义。因此九国公约签字联合会员国,均应遵守其义务,对于中国之奋斗予援助。尤其美国为华盛顿会议之召集者,而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之订立,系属美国之力,故其责任尤为重大。”<sup>⑭</sup>至此开始,蒋展开了又一波以“抗战”为主题的大规模宣传。

12月17日,蒋发表“告军民书”,鲜明指出此次抗战“中国欲外求独立,内求生存,解放全民族之束缚……中国当以抗战到底为本务”<sup>⑮</sup>。预示过去求助国联、较为被动的外交,开始向决心以抗战促援、争援的方向转变。

之所以有如此系列的策略推进,关键在于蒋介石对国际形势的一套分析把握。蒋认为:“日本现在要中国来做他一个国家所独有的殖民地,就先要同世界各强国来决战,如果日本不能和世界各国来决战,他就掌握不了东亚霸权,也就解决不了太平洋问题。这样他就不能在东亚做盟主,也就不能侵吞我们中国。我们要知道,中国内部的情形固然复杂,国际的情形,尤为复杂。”<sup>⑯</sup>蒋所强调的是,中国要面对众多列强以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可以做的只能是权衡利弊,与矛盾次之的国家结盟方可自保。宋美龄更加认为相较之下,“美国的态度和行动也许是在未来世界形成中唯一的伟大决定力量”<sup>⑰</sup>,透露出美国是蒋介石所寄望争取的核心对象。

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宣言上通过《抗战救国纲领》,其中明确提

出抗战时期的外交宗旨:

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对于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之公约,尽力维护并充实其权威;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对于世界各国现存之友谊,当益求增进,以扩大对我之同情;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为。<sup>⑱</sup>

同年6月,蒋介石再次对中日问题和未来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预估,认为中日战争将长期化,日本不可能征服中国,中国也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国际局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欧美列强一定会介入远东战场。在可能向中国提供支持 and 援助的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有实力、而且有望在东亚和泛太平洋地区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国家。<sup>⑲</sup>出于上述考虑,蒋要求“对美英应有积极信赖之方案提出”,“对俄应与之联络”,以此确立“西联英美、北接苏联”<sup>⑳</sup>的外交战略走向,其中更将对美外交定为首要任务。应运而生的“联美”方针,成为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重中之重。

9月20日,蒋向行政院长汪精卫点明,美国才是国联制裁日本的枢纽,并嘱要他所信赖的财经顾问陈光甫在美国多推动舆论<sup>㉑</sup>;孔祥熙也在致新任驻美大使胡适的电文中明确指出,“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唯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10月1日,外交部又再次向胡适电示:“欧战发生,英或倾向于日妥协,且彼需美国援助,我应与美成立谅解,请美严促英勿与日本妥协,增我抗日之困难。”<sup>㉒</sup>对国民政府而言,美国在国际盟友当中的龙头地位,显然不是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可以取代的,而加强对美外交的运筹,还可借美国之力来阻止英国对日本的妥协。这一从暗到明的策略转变,无不清楚地表明,国民政府以对美为重心的外交格局业已形成。

1939年1月,孙科又把蒋介石的联美外交指示电告驻苏大使杨杰,并将其具体阐释为“对苏外交以军事为重心,对美外交以政治为重心,对英

外交以交通、经济为重心”<sup>⑳</sup>，以此铺开对英、苏外交的相应配套措施。不可否认，这对长期处于外交困境中的国民政府，不啻为一次根本性的转折。

### 争取美国“制日援华”的外交努力

如上文所述，以战求援和以美为主的外交重心转移，既是蒋介石无力与日抗衡的迫不得已，也是中国抗战和形势发展的实际需要。“联美”策略一出，其目的就是要尽一切可能争取美国对中国的同情，转而采取支持中国抗战、遏制日本侵略的实际步骤，即修改“中立法”实施“制日援华”。

在开展宣传的同时，蒋介石加大了对美外交的力度。1938年1月30日，蒋致电罗斯福请求援助，称“其希望美国之援助尤属势所必然……吾人急迫之愿望，在美国即于此时在经济上及物资上予中国援助，俾得继续抗战”<sup>㉑</sup>，力求令美方高端明晰中国的抗战态度之坚决，以获物质支持。同年9月，蒋一面任命素称“美国之友”的胡适为驻美大使以投其所好，希望有助于疏通中美外交途径，促使美国修改中立法，物援中国；一面又派颇受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青睐的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的陈光甫，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高级顾问”的头衔赴美争取借款。尽管多管齐下，但收效甚微。蒋因此于10月15日又再次致电罗斯福，强调“如予以相当巨额之贷款……则吾人抵抗日方之攻击亦必获有更大之实力与效果”<sup>㉒</sup>。美国方面也开始隐约透露出立场的改变，认为贷款的主要交换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保证用以继续抗日。蒋获悉此信息之后，于11月1日在给罗斯福的电文中，引用了前一日（即10月31日）“告国民书”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抗战决心要点，以表中方能够满足罗斯福所提的条件要求。美方这才初步表示价值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可在原则上确定，直至12月15日，罗斯福终于批准与中国商谈已久的贷款计划，并向日本发出照会，表示坚守九国公约原则，不承认东亚新秩序。桐油借款的批准，表明美国政策由“对日妥协”开始逐步扭转为“援华制日”。对于这次贷款的经过，陈光甫在日记中坦承，他在美国求援，日夜揣摩美方人士的心理伺机进言，以求博取好感，不敢

稍有疏忽；对罗斯福等更是诚惶诚恐，轻易不敢启齿，“深恐其情绪不佳时，说一‘否’字则一切都完”<sup>㉓</sup>。其中所描述的如履薄冰、步步为营，足见看美国脸色行事、求援的无奈与辛酸。

1939年2月，日本在海南岛登陆。蒋介石在接见外国记者时预言，“吾料不及八月，太平洋上之形势必将突然大变……此为开战以来，对英、美之最大威胁，此后战局必将急转直下，倭寇狂妄，盖已决心与世界开战矣”<sup>㉔</sup>，意在提醒美国注意，日军此举实为“项庄舞剑”，目标不在中国而在美、英。是年3月，蒋介石直接致电罗斯福，要求美国“绝对禁运军用材料器具与日本”，“停止进口日本的重要产品”。<sup>㉕</sup>7月26日，经罗斯福决定，美国务卿赫尔通告日驻美大使，称美国政府决定废除1911年所订立的日美商约。实际上，此举可谓是美国在已知英日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后对中国政府的一种声援。对此，中国当局深感振奋。王宠惠于7月29日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时表示，“该约宣告废止，实可视为美国愿意维持其太平洋区域地位与威望的一种表现”<sup>㉖</sup>。9月1日，欧战爆发，美国对远东政策做出调整，并渐趋积极，陆续宣布对日重要物资禁运，增加对华援助数量，并向中国派出军事代表团和空军志愿人员。

从1938年底到1940年秋，美国先后向中国提供了三笔贷款，每一次贷款都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战略考虑。日本当局提出“东亚新秩序”后，美国宣布了战时第一笔对华贷款，以示对中国反侵略斗争的支持；在日本扶植的汪伪政权即将出笼之时，美国提供了第二笔贷款，表明继续承认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当日本在印度支那采取军事行动，并迫使英国封闭滇缅路后，美国增加了在华的第三笔贷款，与英国的立场截然相悖。这三笔贷款数量不大，但却具有重大的政治象征意味。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力促美国修改中立法、限制对日贸易、尽一切可能争取财政援助的种种努力开始产生效力，对美求援正在按照中国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之后，美国的确依照租借法案相继提供给中国大量军需物资，派遣相当一批军事人员来华，提

供相应的财政帮助;对日禁运各项战略物资,冻结日本在美资金,并下令没收日本所有在美生丝。国民政府认为此次对美外交收效颇丰,“美国对日所采经济制裁步骤,实予日本以莫大之打击”<sup>⑩</sup>,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透过四次易货借款,总计“提供”中国1亿2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不可讳言,单从这点,对增强中国的抗战能力,是极大的支持。

### 推进“联美制日”目标的实现

1940年6月,日本进占安南(今越南)以及荷属印度。蒋介石指示胡适竭力运作,务促美国政府制止日本南下,并为此做出积极表示。<sup>⑪</sup>9月,随着《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署,美国对华政策虽日益好转,但仍奉行“先欧后亚”的方针,对华援助仅限于“保持中国处于战争之中”的状态,目的是要把战火堵在中国本土,而不至引火烧身,伤及其远东利益为限。他们认为,“保持”的本身就是对日本最大的牵制,确切地说,就是利用中国抗战抵制日本侵略的“以华制日”。这与蒋介石所期待的美国加入抗日阵营、和中国携手作战的“联美制日”目标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有消息称“美日之间已有密约”,美国将不再过问中日战争,日本也不再南进,双方甚至要解除资产冻结。事实上,美国竟于1941年3月8日后密谋与日妥协,想以牺牲中国为代价,以换取日本不对美作战和南进扩张。从美国务卿赫尔与日本新任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举行第一次会谈起,至同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前,会谈近五十次,达九个月之久。蒋为此立即致电驻美大使胡适要其以官方立场告知罗斯福,“如美政府希望中国再为太平洋全局与民主主义继续抗战而不至失败,则惟有请美政府即时宣明与日决不妥协之态度,并声明,如日在华侵略军队之撤退问题未有根本解决以前,则美国对日之经济封锁与冻结资金之一贯政策,决不有丝毫之放松,如此日本必能转变其威胁态度,即不然,日亦决不敢与美开衅至多”,“务望美政府当机立断,不再坐误时机”<sup>⑫</sup>,言辞中不乏对美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交换条件密谋对日妥协的公开强烈谴责。蒋同时又电嘱宋子文

转告美方:中国决不赞同放松对日经济封锁;又令外交部长郭泰祺于11月25日正式照会美方,提出美国此种举动是“意图牺牲中国绥靖日本”<sup>⑬</sup>。此外,蒋介石不惜电邀邱吉尔,希望中英联手坚决阻止日美妥协。邱吉尔随即致电罗斯福表示反对,并称“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机”<sup>⑭</sup>。日美妥协,无疑是实施“联美制日”的最大障碍,自然受到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坚决抵制。

12月,蒋又欲致电罗斯福,希望美国能够尽早放弃美日妥协的念头,加入抗战阵营。蒋在电文中阐述了三条:其一,“美国……断不可对日轻率表态……美国之战略方针,不能固定而徒依局部利害或随其他国家为转移,则不独世界全局危险,美国自身亦属危险”;其二,“对日作战应是美国首选的战略考虑……”其三,“美国决不宜为英国所左右而受其影响……应领导英国而使之其明正义以趋于大公无私与盟国切实合作互助之途”。<sup>⑮</sup>不特如此,蒋甚至联络英国,紧急商议部署,试图全力阻止传言中的“美日妥协”。天意不济,1941年12月8日不期而至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打破了美国原想与日本维持的相对平衡,双方一旦失去彼此制衡,随之而来就是美国对日计划的重新调整。大梦初醒的美国当局才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中国抗战的战略价值,把单一的“以华制日”变为与中国合作抗日的主题,无疑给了蒋及国民政府一个充分运用的机会。

如山洪袭来的太平洋战争使措手不及的美国损失惨重,也因此一改美政府几年来对中日战争的不明确表态,他们期望中国军队向在华日军发动全面攻势,最大限度地牵制和打击日本。(而美国在中日战争问题上,长期动摇、中立、绥靖、徘徊,甚至还想与日密签妥协条约,“珍珠港事件”正是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美当局不再倾向以牺牲中国利益保全亚洲势力,而是积极敦促国民党抗日,同时也不再单纯恐惧中国革命力量的兴起,而是希望中国各种抗日团体能够联合起来,以期战略目标的转移,从而达成“以华制日”。这就使长期以来蒋介石一厢情愿的“联美制日”和美国的“以华制日”找到交集,最终促成了蒋“联美制

日”目标的进一步实现。

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早上8点,蒋介石在军委办公室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他在会上正式宣布,自即日起中国对日本正式宣战。<sup>④</sup>

在此次会议上,蒋把焦点集中在了三个方面:其一,太平洋地区反侵略各国应立即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国领导,并推举联军总司令;其二,要求美、英、苏与中国一致实行对德、意、日宣战(是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为避免两线作战极有可能达成一致);其三,联盟各国应相互约定,在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前,不对日本单独媾和。显然,蒋介石对形势的判断和提出的三点意见都极为准确。之后蒋又亲自致函罗斯福,建议成立中、美、英、苏、荷、澳等国军事同盟,在亚洲采取对日联合军事行动,罗斯福当即复电表示支持。

蒋介石始终抱持这样的观点,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和美、英等国共谋建立在亚洲泛太平洋地区的协同作战态势。他为此专门致电包括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在内的盟国首脑,提议在反德、意、日轴心国的基础上,召开一次联合军事会议,在亚洲采取共同军事行动。12月16日,罗斯福首先电复蒋表示同意,文称“为达成此项目的起见,本人建议,由麾下最迟于12月17日,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交换情报,并讨论在东亚战区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本人并建议,参加该会者应为英、中、荷、苏及美国之代表”<sup>⑤</sup>。

12月17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了中、美、英、苏四国军事代表参加的联合军事会议,商定在渝设立中、美、英、苏、荷五国联合作战机构,由美国代表主持,以协调共同保卫新加坡、香港、缅甸、荷属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的具体计划,以及对越南、泰国的军事外交方针。蒋希望借此机会能促使盟国将主要兵力集中于东亚击败日本。中、美双方为此必须在“抗日”问题上休戚与共。

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率先在重庆军事委员会(即蒋介石官邸)举行。参会代表有:美国军界要员勃兰特、马格鲁德等,英国英属印度驻军司令魏菲尔,中方则由蒋介石、何

应钦、宋美龄出席。经过长达11个小时的激烈争论,三方达成“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主要内容为:缅甸、中国以其战略运输的重要地位,首当其冲应成为防御的要塞;美、英将尽现有实力对日军发动空中攻势,并继续供给中国军械;中国军队保持对日发动军事行动,以牵制日军及其战线等,令中国抗战有精神、物质的双重援助,进而使三国联合作战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罗斯福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抗击日本,在征得英国、荷兰政府同意后,于12月29日(中国时间30日)致电蒋介石,提议组织中国战区,以“完成我等共同抗敌力量之联系与合作”,并提出由蒋“指挥现在或将来在中国、安南(今越南)及泰国境内的联合国家部队”。此外,罗斯福还建议,在蒋的指挥下,由中、美、英三国政府代表组织一个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尽可能邀请苏联也参加;同时希望中国战区统帅部、印度英军司令部及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之间保持密切联系,互派联络官员。<sup>⑥</sup>鉴于此,美国基本拟定对华短期目标及政策纲要<sup>⑦</sup>:

美国政府之主要而迫切的目标,是支持中国对日本作战,并在激烈之战争进行期中,动员中国的全部军事及经济力量。为达成此目标,美政府已采取了下列措施:

(一)对中国及中国部队之直接军事援助。

(二)促进中美军事上之有效合作。

(三)鼓励中国人民竭尽全力应付战争。

1942年1月3日,蒋介石被联合国正式推举为中国战区统帅,蒋当即要求罗斯福选派一位“亲信之高级将领为参谋长”<sup>⑧</sup>以协同其工作。罗斯福及美国政府经过精心挑选,派遣“极富才干的高级将领”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sup>⑨</sup>。史迪威的任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对华策略的转变。

事实证明,无论是重庆三国军事会议的召开、太平洋抗日军事同盟的正式形成,还是蒋介石出任最高统帅、史迪威任蒋参谋长的中国战区成立,都标志着中、美各自追求的“联美制日”和“以华制日”最终合体。由单方利用正式发展成双方的支持和合作,中美关系从早期的外交造势,单向的

经济、军事援助,上升为全面的军事合作,这为中国进入大国之列敞开了大门。道路尽管艰难而曲折,但意义非凡。

### 结 语

蒋介石曾以古人范香溪之诗句“是心如太虚,外物如浮云。浮云有去来,太虚无得丧”比喻中美关系:“美国对华之炎凉轻重于我何予,然屈伸消长之理,不可不明,而自强自立乃为一切基本。人之好恶毁誉与亲疏厚薄岂非外物浮云乎。”<sup>①</sup>应该说,蒋介石“联美制日”目标的实现,对成就中国抗战的胜利,奠定中国大国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主要取决于蒋始终认为美、英必然要和日本发生冲突的准确判断,因而适时把外交重心转向美国,进行坚持不懈的外交努力,以及中、美双方各自对日立场的转变。但有一点似乎不能否认,一路走来的“联美制日”充满曲折和艰难,作为弱势国家,中国实在难以摆脱在列强冷漠、蔑视中一厢情愿、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

“联美制日”,既不只是蒋介石的“投靠”,也不仅为美国“出于战略需要的一种给予”,而是蒋介石“联美制日”与美国“以华制日”策略的合流,是中、美双方彼此需要、相互利用的结果。然而,如果不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成为中、美双方的共同敌人,那么不管蒋介石如何努力,“中美结盟”的道路依旧漫长。

- ①《顾维钧、罗文干、刘哲致张学良电稿》(上),《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
- ②1931年9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
- ③张秀章编:《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册),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481页。
- ④《抗战四年来的外交》(1942年2月),转引自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三所史料编辑整理委员会主编:《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三辑第八十一册)。
- ⑤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37页。
- ⑥⑦《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1962年编印,第387~390、468页。
- ⑧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二),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93页。

- ⑧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华文化事业委员会1952年版,第286页。
- ⑨[苏]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 ⑩⑪《蒋夫人言论集》,(台北)生生印书馆1987年版,第61、68页。
- ⑫[美]伊利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台北)新群出版社1949年版,第51页。
- ⑬《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193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292页。
- ⑭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台北)中华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3~1064页。
- ⑮(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蒋委员长对外交之训示”(1937年7月~1941年4月),分类号:814,案次号:0009。
- ⑯《抗战史料丛编初辑》(第一册),(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74年编印,第338、339页。
- 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蒋介石丑史及谬论》,全宗号:(二),案卷号:11109。
- ⑱程思远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下册),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30~3931页。
- ⑲参见章百家《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 ⑳参见蒋永敬《抗战初期的外交与国联及德使之调停》,《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5辑)。
- ㉑(台北)“国史馆”馆藏“蒋档”:“蒋中正电汪兆铭国联制裁日本枢组全在美国囑在美多推动舆论”,分类号:2010.3,分类名:抗战时期,序列号:4450,01,册号:16,册名:蒋中正筹笔(抗战时期),目次号:65。
- ㉒《中华民国史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第三辑)《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页。
- ㉓孙科:《我对外交政策的态度》,载《孙科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1092页。
- ㉔①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一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332、91页。
- ②章伯锋:《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页。
- ③④吴相湘编:《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714、771页。
- ⑤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八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119页。
- ⑥重庆各报联合版,1939年7月29日。
- ⑦(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外交部王郭任政绩交代比较表”,分类号:802.9,案次号:0002。
- ⑧⑨(台北)“国史馆”馆藏“蒋档”:“宋子文电蒋中正兹代拟谢

罗斯福援助中国及请电示与其长子谈话情形”,1941年11月2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8A-1545,光碟号:08A-314,特交档案档号:080106第025卷002-080106-025-006-001a~002-080106-025-014-016a。

⑳[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十二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4年版,第188页。

㉑《抗战史料丛编初辑》(第二册),(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74年编印,第298页。

㉒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1981年编印,第66页。

㉓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Vol. 4, 1941, pp. 763 ~ 764.

㉔《雅尔塔会议记录》(全文),(台北)联合报社1955年版,第38~39页。

㉕[日]古屋奎二:“蒋介石1942年1月反省录”,《蒋总统秘录》(第十三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4年版,第15页。

㉖《罗斯福致蒋介石电》(1942年3月13日),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Volchina, 1942, p. 29.

㉗(台北)“国史馆”馆藏“蒋档”：“蒋中正接见居里与谈印度局势及中俄关系,并向其声明如苏联能停止对华之共产宣传及不作中国共产之后盾,则两国关系即可改善,另又对其建议此后租借器材改由中国军政部向美军代表团提出交涉,表示实难骤行,请向华府方面说明中国之困难,俾得减轻阻碍,另为紧急空运器材问题向其婉告不可停止,至于设计此次器材之使用计划则望偕同史迪威与何应钦详商拟订等。”1942年8月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6-167,光碟号:06-00756,档号:060100第167卷002-060100-167-005-014x~002-060100-167-006-010x。

作者简介:张祖葵,1980年生,历史学博士,四川农业大学政法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潘清〕

## 《江海学刊》荣获“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期刊”称号

2009年12月22日,由中国期刊协会主办的“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期刊”颁奖大会在京隆重召开,《江海学刊》从近万种参评期刊中脱颖而出,获得“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期刊”称号,江海学刊杂志社韩璞庚总编辑代表《江海学刊》上台领奖。

自1958年创刊以来,《江海学刊》始终以“办传世名刊、载精品力作”为宗旨,努力实现“新颖、深邃、凝重、厚实”的办刊风格,关注学术前沿,弘扬先进文化,刊发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获得包括国家期刊奖、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在内的一系列荣誉,为繁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获此殊荣的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还有《学术月刊》、《西藏研究》、《读书》等。